

# 物化问题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矛盾： 论卢卡奇的批判方式

崔唯航\*

**【内容提要】** 卢卡奇通过对商品拜物教的剖析，揭示了物化现象的生存本性，即人的存在方式正在被形式化统治下的物的存在方式所替代。康德哲学与物化现象构成了一种共谋关系。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致力于消解物自体，走向统一性。黑格尔哲学试图在彼岸世界完成思辨意义上的统一，但不能扬弃现实世界的物化现象。卢卡奇发现了无产阶级的重要作用，为实现统一找到了推动力，但他依然停留在观念层面上的推演，对问题只能是一种理论的解决，而不是现实的解决。

**【关键词】** 物化 二律背反 形式主义 无产阶级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被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因有两个：其一，它构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框架，并为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武器：其对物化现象的指认及其超越开启了异化理论的批判路径，这一点被其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发扬；其二，它试图以思想的方式洞穿现时代人的生存困境。卢卡奇写于1960年代的自序当中曾指出：“吕西

---

\* 崔唯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安·戈德曼把海德格尔的著作解释成在某种程度上是直接对我的回答。”<sup>①</sup>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历史与阶级意识》与《存在与时间》作为产生于1920年代的两部哲学巨著，包含对同一时代人类生存困境的观照。只是卢卡奇借助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海德格尔借助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二者所依托的思想资源不同，相应的观照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但就其对现代人因主客分裂的诊断及试图探寻统一性之路径而言，却异曲同工。

黑格尔曾说“哲学也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超出它的现在世界，就像一个人妄想跳出他的时代之外，跳出罗陀斯岛一样，是愚蠢的。”<sup>②</sup>对于卢卡奇而言，其作为哲学家的本质体现在他一方面发现并挖掘了现代社会物化现象的存在和根源；另一方面将其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困境联系起来进行了深度考察，展现出思想对于现实的穿透力。在卢卡奇看来，物化问题不仅源于康德思想，并成为其后的德国古典哲学试图解决，但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一部分的精彩阐述集中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章中的前两节：物化现象与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这两节就其思想内涵而言是丰富的，但其中试图凸显的核心观点和问题还需要更为清晰的梳理和辨析。本文尝试将其对物化现象的考察与其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剖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展现二者内在关联的基础上，彰显卢卡奇哲学中所蕴含的思想对于时代的穿透力及其当代意义。



对于“物化现象”一节的描述，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似乎并不困难。其中包含诸多现象层面的直接描述。由于卢卡奇在写作本书的时候，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没有出版，所以卢卡奇并没有看到马克思本人关于“异化”理论的表述。卢卡奇所依据的是其对于《资本论》的阅读，以及马克思·韦伯的分析合理化思想与齐美尔的货币哲学理论。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篇处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

①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17页。

②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6，第13页。

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sup>①</sup> 卢卡奇也指出商品的普遍化与偶然的商品交换之间的根本不同。商品作为一种可交换、被交换的物，其所彰显的是一种交换关系，物只是这种交换关系的承载者，但当商品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样态之后，其关系性的本质就被其物化的外在样态所掩盖。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正是对于这一掩盖的揭示。“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sup>②</sup> 卢卡奇从中抽取出了有关“物化”（Verdinglichung）的说法：人的存在正在被物的存在方式所替代，换言之，人的存在只有在物化的存在样态中才能得到最好的说明和显现。

近年来，随着一些外国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引入，商品拜物教中的物化现象，又被表述为物象化（Versachlichung），意图说明拜物教所表明的不仅仅是人变成物，更意味着人与人的关系正在被物与物的关系性存在所替代。在此需要提醒注意的是，物化和物象化在德语中的差别在于构成中一个是“ding”，一个是“sach”。Ding 与人无关，而 Sache 却是与人相关的。由此，当我们再一次反观卢卡奇物化观念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分析是否准确把握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真谛？对于此问题的研究，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透过卢卡奇对于物化现象的考察，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致的判定：物化概念在卢卡奇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予以描述的意义上是准确的。这是因为卢卡奇抽取出物化概念所意图指出的正是人的存在与人相梳理，甚至相对抗的状态。从这一意义上说，Ding 与人的对抗性较之 Sache 更为强烈。

在卢卡奇看来，商品的普遍化所带来的异化，包含主观与客观两个预设：客观方面是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所构成的世界（商品及其在市场上运动的世界）；主观方面是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被客观化，变成了一种商品。严格说来，这是一个被抽象所统治的世界，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对其加以说明。

其一，卢卡奇揭示了现代劳动原则，这一原则由两个方面构成：第一，劳动过程的可计算性要求打破产品自身所具有的有机的、始终由质所决定的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7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9~90页。



统一性。第二，生产的客体被分为许多部分，以实现劳动的合理化。由此带来劳动的可计算性，以及劳动分工的“合理化”取向。在此卢卡奇引用了马克思·韦伯对于法官工作的描述，将其类比为一家法律条款自动机，“人们在这架机器上面投进去案卷，再放入必要的费用，它从下面就吐出或多或少具有令人信服理由的判决：因此，法官行使职责至少大体上是可以计算出来的”<sup>①</sup>。在此，人彻底失去了属人的关系性存在，而更多的变成了与人无关的 Ding 的存在样态，这样的无创造性的劳动分工最终带来的必然是劳动者劳动态度的变化。

其二，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采取一种直观的态度，变成了站在机器边上的旁观者。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劳动过程不再带来创造性，因为一切都被预先设计好了，在劳动过程中不会有“偶然事件”发生。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被机械地安置在一个固定位置上，其工作方式止步于观察和操作，即监视机器的正常运行。这样劳动者就变成了冷漠的旁观者。“对他自己的、客体化了的和对象化了的能力所起的作用也采取直观态度。”<sup>②</sup>

其三，物化现象不仅带来人的劳动方式和劳动态度的变化，同时也获得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新的阐释路径。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包含内在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结构建立在以下两个方面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一方面，就单个生产而言，是理性的，存在合乎规律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就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而言，却是非理性的。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规律，一方面，相互独立的个别商品生产具有合理的规律性；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生产却缺少理性可以操纵的规律性，也就不能被认识。“一方面，一切个别现象中存在着严格合乎规律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总过程却具有相对的不合理性。”<sup>③</sup> 卢卡奇在此运用了认识论的模式，即以认知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言说方式替代了马克思对于资本内在矛盾的分析。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机器大生产与私有制组织形式之间的矛盾，那么对于卢卡奇而言，这一矛盾则意味着合乎理性的社会组织安排带来的分工和异化，破除了对于事物总体性认知的可能性，从而使得总体性认知成为不可能。这一不可知性在本书中被卢卡奇视为一种“非理性”。而一旦人们

① (匈)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 165 页。

② (匈)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 169 页。

③ (匈)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 172 页。

试图去把握这种规律，那么反而要求破除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分工和合理性，这也就意味着破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基于以上对于物化现象的分析，卢卡奇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种批判理论的架构方式，即一方面资本主义分工协作的合理性带来人存在的物化，其可被计算性意味着人的存在的形式化，物化带来的是无内容的形式化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作为内容存在的总体性成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立的观念性存在。要批判物化现象，对总体性的呼唤就必不可少。

## 二

对于物化现象的分析，让卢卡奇看到了它所隐含的生存本性：形式主义与非理性成为其核心特质。对于卢卡奇而言，面对这一时代特质，哲学家所能做的，不仅要指出它的本质所在，而且要揭示表征这一本质的哲学，并以另一种不同的哲学予以替代。由此，作为形式主义代表的康德哲学，特别是其所提出的关于物自体的非理性本质（即不可知性），自然就成为卢卡奇首先加以批判的对象。

在卢卡奇看来，康德哲学与物化现象之间拥有一种共谋关系。卢卡奇的工作首先是要揭示出这一共谋关系：康德哲学的核心在于不再把世界视为独立于认识主体的存在物，而是将其视为认知主体的产物，即认识与认识对象的同质性必须得到确定性的保障。这一认识论保障不仅是一个哲学的构造，它也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后者对于人的物化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的关键在于康德的这种类似于“主观主义”的彻底性将所有不能被理性予以合理化的事物都排除在外（如同物自体那样），其结果自然是形式主义的泛滥。

为了破除康德的形式主义，卢卡奇的策略是把这种形式主义的认知方式予以历史化，使其仅仅成为近代的产物。他这样概括康德式的问题“把形式的和数学的、理性的认识，一方面和认识一般，另一方面和‘我们的’认识简单武断地等同起来就是整个这一时期的最突出的特点（甚至连最具有批判精神的哲学家也是如此）。对人类思想史，特别是对近代思想兴起本身最粗浅的考察就告诉我们，这两种等同都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得住脚的。”<sup>①</sup>

①（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85~186页。



这就意味着,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样的理性主义只是近代的一个传统。“近代理性主义的新颖之处就在于,随着它的发展而愈来愈坚持认为,它发现了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生活所面对的全部现象相互联系的原则”<sup>①</sup>。所以不能将理性主义视为人类思想的超历史规定。

康德哲学是近代哲学的一个典型形态,但康德却并不与其后继的德国哲学家相一致。康德虽然提出了理性获得确定性的基本原则,即人只能认识自己所创造的事物,却以物自体的设定凸显了非理性对于理性主义的界限,康德以后的哲学家则不断尝试以各种方案解决物自体问题,其根本旨趣在于把理性的潜能发挥到极致,让理性主义吞噬掉一切可能的非理性存在。

由此可见,康德哲学与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并非一种简单的线性发展关系,而是一种倾向于相对平行的关系。这一点也得到了历史事实的确证。当时康德就曾写信宣布自身与标榜是其思想传承者的费希特主义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一点,那么我们将很难读懂卢卡奇在“资产阶级思想二律背反”当中所展开的讨论。

何为“资产阶级思想二律背反”?简单说来,可以称之为理性的形式主义与无法被形式主义所囊括的内容之间的背反关系。这里产生背反关系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涵盖了康德之后的许多德国古典哲学家,如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但是否包含康德,却是一个问题。康德和后康德的德国古典哲学都试图为思想设定理性主义基调,但都遭遇非理性的限制。理性主义要彻底推行自身,就要坚持形式主义的原则,忽略掉那些不能被形式主义所容纳的内容。康德摆出了这个限定,用承认理性界限的方式来悬置这一问题,物自体在康德那里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质料的问题(Problem der Materie),即我认识我所创造的世界的内容问题;第二,可以归结为整体的问题和认识的最终实质问题。在此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在卢卡奇对于康德思想的推演中,他特别强调了质料中包含的不能被知性所把握的感性(Sinnlichkeit)部分,即所谓经验事实(die empirischen Tatsachen)。在此,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卢卡奇在谈论所有不能被知性(即理性的形式主义)把握的内容时所运用的词汇,是事实(Tatsachen)与事实性(Tatsächlichkeit),而非Ding。在此事实性中所包含的并不是与人无关的Ding,而是一个涵盖着Sache在内的事实抑或事实性,就逻辑的推演而言,人可以认知和把握Sache。在黑格尔哲

<sup>①</sup>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87页。

学当中，对于事情本身（Sache Selbst）的把握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正是它才超越了康德的物自体（Dinge an sich）思路，卢卡奇也正是试图借助这种可能的统一路径来超越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即使忽略这些因词源考据而产生的学理问题，卢卡奇所勾勒出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内部的二律背反仍然是富有见地的，卢卡奇的表述如下：

这一体系化的原则和对任何一种“内容”的“事实性”（Tatsächlichkeit）的承认（这一内容——原则上——是不能从形式的原则中推导出来，因此只能被当作事实而加以接受）必定是不能统一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矛盾和悲剧正在于，它不再——像斯宾诺莎那样——把每一个既定的事实当作不存在的东西，并让它们消失在由知性创造的理性形式的宏伟建筑后面，而是相反，它把握住了概念的既定内容的非理性特征，牢牢地抓住这种特征，超越和克服这种证明，力求建立体系。<sup>①</sup>

德国古典哲学无法忽视物自体问题为理性留下的缺口，但正是在对这一缺口进行弥补的过程中，它展现了物化现象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陷入的二律背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危机，即在分析合理性的分工当中失去了对生产总过程的认识和把握，正如德国古典哲学坚持理性主义（知性、形式主义）原则无法去把握物自体一般。

### 三

面对这一困境，康德之后的哲学家不断探索解决的方案。对物自体的消解之路其实就是探寻克服物化现象，走向统一性的道路。拒绝分裂的现实，走向统一性，是后康德哲学思想求索的主线。但究竟统一为何，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

费希特的解决方案是改变哲学的出发点，即哲学不再从事实出发，而是从行为（Tathandlung），即从纯粹的活动（Tätigkeit）出发。从事实出发，必将陷入存在与有限的世界当中，没有通往无限的道路；从行为

<sup>①</sup>（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92~193页。



(Tathandlung) 出发, 则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在此行动成为主客统一的方式, “从同一的主体 - 客体 (identische Subjekt - Object) 出发, 把每一种既定把握为同一的主体 - 客体的产物, 把每一个两重性把握为从这种原初统一中派生出来的特殊情况”<sup>①</sup>。卢卡奇进一步指出, 费希特使得 “认识的主体, 即自我, 被把握为连内容也是已知的, 并因此被把握为出发点和方法论的指南。于是, 从极其一般的角度来讲, 就形成了这样的哲学倾向, 即达到这样一种主体的观念: 这个主体能被设想为全部内容的创造者。同样从完全一般的、纯粹提纲挈领的角度来讲, 就又形成这样的要求: 发现和指出对象性 (Gegenständlichkeit) 的水平, 即客体建立的水平, 在这一水平上, 主体和客体的两重性 (思维和存在的两重性只是这一结构的特例) 被消除了, 主体和客体融合了, 同一了”<sup>②</sup>。

在卢卡奇看来, 费希特在本质上对于康德哲学的追随, 导致其行动仍然更多地意指一种道德行为, 从而与知性和感性仍然存在不可逾越的异质性。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是: 现象与本质的分裂由外在的分裂 (主客体、自然与自由) 转变为主体内在的分裂。由本源行动所构筑的统一性内在包含自我与非我的对立, 两者在黑格尔所谓 “恶的循环” 当中仍然无法获得真正的统一性。由此, 费希特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将康德的理性主义原则推到了极致, 从而彻底彰显了它所内在的二律背反: 我们所创造的事物, 同时又作为与我们异在的, 与我们疏远的存在, 成为与自我对抗的宿命。在卢卡奇眼中, 这一古典哲学的内在困境, 同时也是现代物化社会现实中人的生存困境 “人们在其中一方面日益打碎了、摆脱了、扔掉了纯 ‘自然的’、非理性的和实际存在的桎梏; 但另一方面, 又同时在这种自己建立的、‘自己创造的’ 现实中, 建立了一个包围自己的第二自然, 并且以同样无情的规律性和他们相对立, 就像从前非理性的自然力量 (正确些说: 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 所做的那样。”<sup>③</sup>

在此,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德国古典哲学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内在同构性, 同时更应发现卢卡奇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重心所在, 我们将其归纳为对自然概念的理解和对主体性的重构。

① (匈)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第 200 页。

② (匈)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第 199 ~ 200 页。

③ (匈)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第 207 页。



首先，当卢卡奇完成对费希特的解决方案的讨论之后，自然的问题就进入其理论的视野。对于卢卡奇来说，主观主义的统一性已经将自然纳入人的创造性范围之内，即构筑了第二自然，自然，由此成为“规律的化身（Inbegriff der Gesetzmäßigkeiten）”。而这在本质上意味着现实的日益合理化的趋向。但这个似乎已经进入人的观照视野之内的存在却并不能带来一种主体性的建构，“现实越是彻底地合理化，它的每一个现象越是能更多地被织进这些规律体系和被把握，这样一种预测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清楚的是，现实和‘行为’主体的态度越是接近这种类型，主体也就越发变为只是对被认识的规律提供的机遇加以接受的机体。他的‘行为’也就更局限在采取这样一种立场，以使这些规律根据他的意思，按照他的利益（自动地、不受他的干预地）产生作用。主体的态度——从哲学的意义上来看——将变成纯直观的”<sup>①</sup>。

换言之，这一被内化了的非我（自然）并不能真正地带来富有能动性的主体。对于卢卡奇来说，主体在这种作为规律的自然面前仍然只能是一种直观的态度，正如劳动者在现代劳动原则中的基本劳动态度。因此对于真正的富有能动性的实践行为，并不应建立在这种主观主义的统一性基础之上。然而这种主观主义的统一性缘何无法带来真正能动的主体，在卢卡奇看来，主要是“由于其物质基础乃是先验的，始终保持在不可消除的偶然性中，本该以这种方式得到拯救的主体的自由，由于是空洞的自由，也不能不跌入宿命论的深渊”<sup>②</sup>。

#### 四

真正的主体性的建构需要认识到“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sup>③</sup>。自然的社会属性决定了自然是人自身创造的产物，人的行动创造自然，同样也就可以把握和认识自然。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卢卡奇只能算是一个康德主义者，即人只能认识和把握自己的创造物。然而，卢卡奇所探寻的主体性原则绝不仅仅是认识世界，而是要去改变世界。他所面对的是生成、变化本身

① （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09~210页。

② （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14~215页。

③ （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10页。



的可能性，他所试图弘扬的主体性原则恰恰是能够认知和把握这种“自在之物”的主体。卢卡奇在此将这种主体性的产生诉诸辩证法问题之上。

对于卢卡奇来说，辩证法的本质意味着总体性的观念。而这一总体性过程所意指的是历史过程。“主体在这儿既不是存在和概念的客观辩证法的不变的旁观者……也不是它的纯思想可能性的实际主宰者（就像在希腊的诡辩家们那里那样），而是辩证的过程发生了，主要是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成不变形式的僵硬对立溶化了。……只有当主体（意识、思维）同时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产物，只有当主体因此在一个由它自己创造的、它本身就是其意识形式的世界中运动，而且这个世界同时以完全客观的形式把自己强加给它的时候，辩证法的问题及随之而来的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等等对立的扬弃的问题才可以被看作是解决了。”<sup>①</sup>

在历史辩证法的发展过程中，主体既是旁观者又是主宰者，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它的产物。换言之，这一辩证的主体性既产生于这一历史过程，同时又是这一过程的创造者。或者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作为理性认识中的自在之物的“生成”正是这一主体性原则的基本属性。这一主体性原则对于物化现象的克服，从而对于人的复活都建筑于这个“生成”之中。

黑格尔将历史性和生成性引入哲学之中，但无法构筑一个现实的主体性原则，原因何在？在卢卡奇看来，这是由于黑格尔哲学自身陷入了概念的神话。这不仅意味着黑格尔对于现实的经验事实自身真理性的无视，同时也意味着他对于在现实世界之中实现对物化现象的超越，即实现统一性原则所持有的否定性态度。“由于黑格尔哲学已经不可能在历史本身之中发现和指出同一的主体-客体，所以它被迫超越历史，并在历史的彼岸建立自我发现的理性的王国。然后从这个理性的王国出发，把历史把握为阶段，把出路把握为‘理性的狡黠’。”<sup>②</sup> 问题在于，如果统一只能发生在彼岸世界，那么历史也就最终成了先验的历史。它从根本上与人的认识与创造处于此岸与彼岸的对立之中，在这一对立中，统一性实际上再一次沦为一个不可被人所把握的物自体。

对于卢卡奇来说，不仅要发现近代社会的物化现象，以及这一现实与近代哲学之间的共谋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要探寻一条走出这一现实和理论困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26~227页。

②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33页。

境的道路。这一道路不仅需要逻辑上的合理性，同时还应具有现实性。因此，他虽然在其对物化和物化之扬弃的分析中采用了黑格尔的思考路径，但对其在彼岸世界中探寻统一性原则却不认同。在卢卡奇看来，统一性原则不是一个先验的秩序，而应是一个富有生成性，同时也在不断创造新的生成性的主体性。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主体性角色落到了一个阶级之上，即无产阶级，“把这种转变继续下去，并把辩证的方法当作历史的方法则要靠那样一个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sup>①</sup>。

对于卢卡奇来说，之所以能够发现无产阶级的重要作用，离不开其对物化现象与近代哲学之间共谋关系的洞察，正是由于有了无产阶级，解决近代哲学的内在分裂，进而实现统一才有了推动力。但必须指出的是，卢卡奇对于无产阶级重要作用的发现，主要建立在理论上逻辑推演的基础之上。这也就意味着，卢卡奇所发现的无产阶级仍然是观念层面的发现，其对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是理论的解决，而不是现实的解决。要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使其发挥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的角色，就决不能仅仅停留于观念层面的反思，而必须进入社会现实的层面，像马克思那样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特别是其私人占有的所有制关系展开彻底的批判。唯有如此，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实现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历史使命。

---

① [匈]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 236 页。